

思想·色彩·情调

文学作品评论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文学作品评论集

思想、色彩、情调

姚雪垠



题答

湖南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思想·色彩·情调

湖南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编

责任编辑：肖汉初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16,000 印张：11 印数：1——13,500

统一书号：10109·1706 定价：1.00元

更上一层楼

——文学评论集《思想·色彩·情调》序

康 濯

这一本《思想·色彩·情调》，是继早已出版的《情·真·美》一书之后，我们湖南的又一本文学评论选集。两本书中的所有作者，都是本省各地从事文学评论工作的同志。两本书所评论的，也主要是本省当代作家中较有代表性，并仍然活跃于当前创作界的部分作家的作品。两书不同的是，《情·真·美》论及的主要是建国三十年来湖南的优秀之作，以及一部分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最早出现的优秀作品；而这一本书论及的作品，则绝大部分是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近两三年出现并受到读者和文艺界称道的。本书编辑过程，已有《后记》说明。我这里只就个人所见，试谈几点近年间湖南文艺创作的特点。

湖南的文艺创作，最近几年受到了全国和各地文艺界一些同志的注意，有的报刊和作家、理论家甚至还评价颇高。事实上这几年我们文艺界也确实涌现了一批大有希望的新

人，写出了一批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近年来我省文学艺术各方面在全国获奖的作品共八十七件，其中有的美术、戏剧作品，省内外称颂颇多。不在这一数目内而获得今年全国奖的甘征文创作的花鼓戏《八品官》，目前也正获得省内外较广泛的赞誉。文学创作情况比起来还要显著。在全国获得中篇小说一等奖的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二等奖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获短篇小说奖的叶蔚林《蓝蓝的木兰溪》，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以及未获奖的《月兰》，都早已誉满全国。长篇小说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镇》、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中篇小说水运宪的《祸起萧墙》、谭谈的《山道弯弯》^①，更都在读者中和文艺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周健明、谢璞、张步真、叶之蓁的新作也同样倍受注意。这里提到的以及没提到的作品，有的热情歌颂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有的深刻揭露了林、江之乱给我国人民造成的严重伤痕及其被医治的过程，有的展现了各条战线在近年的变革中给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带来的深刻变化，有的讴歌了为四化艰苦创业的社会主义新人，有的表现了知识分子在新长征道路上的思想风貌，有的则对当代青年的生活、理想、爱情等方面的追求进行了探讨。当然近几年湖南创作也有不少缺点，即使是优秀之作也难免瑕疵。外地评论中由于

① 《将军吟》、《芙蓉镇》已获一九八三年全国茅盾文学奖，《祸起萧墙》、《山道弯弯》获一九八三年全国中篇小说奖。

从鼓励出发而或有对我们估计过高的，这既是给我们的鞭策和激扬，也在告诫我们必须头脑清醒，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我对湖南近年来的文学创作尝试着归纳、分析的下面几个主要特点，就也都是一分为二，涉及到正反两方面的。

第一、我们近年间创作的首要特点，是作家们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既思想解放，又积极稳重，做到了活而不乱，有为而治。因而绝大部分作品都能立足于歌颂，既有力地揭批了林、江反党集团的罪行，揭示了我们社会主义前进中的问题和某些阴暗面；又未停留于单纯的揭露，而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讴歌了革命和四化建设中前进的力量及其斗争的胜利，同时也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得以给人启迪，使人鼓舞，激人向上。就是说，许多作品都是站在时代的高度，触及到生活的纵深和时代的脉搏；抓住了一些当前生活中值得深深思索的，或使人激励、振奋，或令人惊醒、警惕的问题；塑造了一批社会主义新人和各种人物的形象，其笔力并深入了人物内心，刻划了人物性格和精神风貌。从这些作品中可以触摸到时代的跳动，看到题材的广泛，人物的多样，又是反映工农兵及其斗争生活为主，因而在影响、推动生活上起了积极的作用。这都充分体现了我们的文学艺术坚持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了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说明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和广大文艺工作者是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了政治上的一致。这是我省文艺创作的基本特点和首要经验。

必须特别提到的是，为了坚持正确的方向，就应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生活和熟练掌握艺术表现的能力。尤其是要认真地用马列主义观点深入分析生活，从而尽可能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深刻反映当前生活的动向和问题。我们都知道莫应丰的《将军吟》，是我国最早一部比较深刻地描写了“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小说，作品中颇为惊心动魄地揭露了十年内乱给我党、我军以及老一代革命家直至各阶层人民的摧残、迫害，与党的老一代革命家在广大干部、群众支持下不屈不挠的斗争；作者是最早处理这样的题材而并无先例可循，其初稿又是粉碎“四人帮”之前的七六年春天完成的，当时简直还难于想象党中央会在哪一天对“文化大革命”做出怎样正确的结论，那末，难道莫应丰同志是个预言家吗？当然不是，不过这却是他除了生活上和技巧上较充分的准备外，显然主要在于有着一定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以及胆识和见地所致，即主要在于他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分析、概括和提炼生活所致。可见三中全会路线早已开始在党内和群众中逐步奠定思想基础。因而要坚持文艺的正确方向，首先就必须用马列主义努力武装自己，以求得从实践上真切地掌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

还可以看看任光椿的长篇《戊戌喋血记》的写作过程。这部反映戊戌变法并肯定其主要人物谭嗣同的历史小说，作者当然是早在进行间接准备，因为他决不可能直接体会任何一点其所写题材。而他又是业余写成，七八年即已脱稿。试想：七四年江青之流不还在气势汹汹地批儒批孔？不还正

把在一定条件下推行改良主义的谭嗣同这些先进分子斥为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和反动派？不是直到七六年春天也还在对所谓投降主义进行批判？可见如果作者没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以及胆识与见地，不是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那也肯定不可能在所谓批儒批孔批投降派的不久之后，就准备充分地写出这一同江青一伙针锋相对的作品。

总之，要在创作上坚持正确的方向，首先就必须努力锻炼自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正确认识、分析和概括、提炼生活的能力；而为此就必须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这也就是首要的根本所在。

这几年我们湖南文艺界总的方面是努力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同时也有过一些或“左”或右的缺点和问题，这虽都是次要的，但也必须注意克服。比如有一个口号叫做“大胆干预生活”，我们也有个别同志提倡过。我以为提倡也未可厚非，问题是对这个口号必须具体分析。如果把“干预”当成暴露、批判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那是极其错误的；如果是当作抓住时代脉搏，提出生活中广大人民关心的问题以影响读者，那当然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表扬都可以“干预”。至于“干预”是否“大胆”，就看你是否有充分的思想、生活和艺术准备，如有，就可能大胆；否则，没有把握，那只会放任，只会出现自由化，把胡思乱想当作解放思想。当然，只要具备思想、生活和艺术上充分条件的大胆，这还是好事，我们仍然是提倡的。

第二、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在创作实践上，都能植根于生活，注意了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而不是从某种概念和个人偏见出发。文学艺术的特点就是反映生活和塑造人物，特别是要反映人民的斗争生活，塑造时代新人和各种性格的人物。如果离开了生活去凭空编造，哪怕你花样多么翻新，也是纸扎的鲜花，是没有生命力，没有根基的。我们湖南这些年的创作，特别是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可以说都是作家、艺术家身之所经，目之所见，心之所感的，即周扬同志曾经说过的所见、所感、所信，也都主要是这十多年大家的生活积累。哪怕历史题材的作品，也是作家受当代思想和生活影响的产物，没有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大家写十年内乱，写社会主义建设，写四化，乃至写民主革命和古代历史题材，由于都经历了十年内乱的坎坷锻炼，因而大多是写熟悉的以及有着新的深刻感受的东西；或者是当前需要而深入生活中去熟悉、补充了才写；或者象我省美术作者在感到难于突破后于七九年大批下乡下厂，便立即生机勃勃。特别是常德、益阳地区的领导重视组织文艺作者深入生活，因而创作成绩较为突出，这即是作品的根基较厚，时代感较强烈，又有浓厚的湖南地方气质，人物形象比较丰满，尤其是还创造了一批受到称道的社会主义新人，如《将军吟》中的彭其，《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中的盘老五，《芙蓉镇》中的粮站谷主任，《祸起萧墙》中的傅连山，《甜甜的刺莓》中的女支书，《山道弯弯》中的金竹、二猛等，就都是受到全国读者广泛欢迎的新人形象，是来源于我们时代生活的先进分子，

也都是我们创造新人的榜样。而我们创作中那种缺乏生活，图解主题，生编硬凑，人物概念的东西则不多见，尤其那种以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来泄个人私愤的现象还没有发现。

由于从生活出发，我们的作品在创作方法上就都遵循了革命现实主义，有的也运用了革命浪漫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前进。不少好的作品还打破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表现手法，获得了可喜的新的突破，但又没有离开我们的民族传统、民族习惯和民族爱好，所以大家所接受和欢迎。那种为形式上创新而创新，不在思想和艺术质量上下功夫，一味追求表现手法，因而脱离群众，孤芳自赏的现象，在我们省虽并非没有，但还不多见。这同我们省大多数作者都拥有比较深厚的生活基础是分不开的。文艺创作没有生活就无从下笔。仅从艺术表现来说，一篇作品不外叙述、描写，而描写是主要的，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展开，主题的完成，都离不开描写。作者在一篇作品中，既要善于艺术地抓住什么地方应叙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什么地方应描写、展开、烘托、深入、细致；又要对必须描写的场面真正拥有生活。如《梁祝哀史》中的展开描写倘若放在梁祝三年同窗共学，梁山伯竟没有发现祝英台是女的，那就庸俗、低级了。我国传统戏曲抓住“十八相送”来展开描写，这样既突出了人物性格，深化了情节和主题，又有了紧紧抓住观众的悬念，并得以充分发挥现实主义的概括力和浪漫主义的精神，也得以尽情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而这一切的关键在于作者拥有描写“十八相送”的生活基础，这样才既抓

得准，又抓得稳。准是来于思想和艺术的选择，稳是来于生活基础的厚实。再看我们创作中《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的盘老五和《芙蓉镇》的谷主任，都形象逼真、鲜活，感情真挚、深沉到撼人肺腑，甚至他们各自的缺憾也自然、合理而令人同情；这也都同样是得力于作者拥有的革命现实主义提炼之功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也得力于叶蔚林着重对风物吟唱、抒情交织的浪漫手法，和古华着重对乡土浓涂淡抹交辉的浪漫手法。而他们这一切所共有的基础也都是来于生活。叶蔚林就曾在他描写的潇水之滨多年劳动，并跟随盘老五式的放排工打过下手，从而一同喝酒，一路放排。古华更在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干过十四年农业工人，也曾深入荒凉的边远林场工作过。他们近年的作品誉满省内外，首先自然也是来于他们农村生活的厚实。

第三、我省的作家和艺术家已开始培意培养和树立自己的艺术特色和艺术风格，并在不断地努力向艺术高峰攀登。这是我省近些年创作的又一特点。文艺之道，贵在创新。古人把小说、杂剧都叫做传奇，所谓“奇”，就是新的意思，传奇就是传新。所谓新，包括作家、艺术家所表现的题材、立意、结构、情节和个人风格。清朝戏剧家李渔说“非奇不传”，意思是没有新东西就不写、不演，写了，也不可能流传下去。清朝另一个戏剧家孔尚任把这个观点又推进了一步，说：可以“不奇而传”，意思是从平常的事件中，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开掘出不寻常的激动人心的主题，写出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讲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他的

《桃花扇》就是很好的注脚。“非奇不传”和“不奇而传”这两个观点其实是统一的。宗旨不离“奇”，即新。不过后一个观点比前者更发展了一步。当然这个“奇”和“新”源于人民的生活，象“无巧不成书”、“巧夺天工”、“鬼斧神工”这些民间成语的意义，也即是集中人民智慧的故事、情节和典型人物及其性格的表现，而不是追求惊险离奇。那种脱离生活，一味追求惊险离奇，庸俗低级的所谓“奇”，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也不可能流传，得不到群众的赞赏；因为这种所谓“奇”其实不是“新”而只是“怪”，当然会要“怪而不传”的了。从我省近些年的创作看，不少同志已注意及此，有的同志比较注意“非奇不传”，有的同志做到了“不奇而传”，即化浩繁于简洁，化腐朽为神奇，从平凡中提炼出不平凡。同时又避免了离奇古怪，做到了“怪而不传”，并逐步树立了自己的风格。象叶蔚林、孙健忠、古华、张步真、谢璞、莫应丰、韩少功、任光椿、水运宪等作家近年的作品，不仅注意了题材、立意、结构和人物出新，而且开始形成了各自的地方气质和各自的个人风格。他们的作品摆在一起，即使不署作者的名字，精心的读者也可以分出来。在艺术界也不例外，如陈剑秋、陈荒的剧本和杨应修、陈白一、刘寄踪等同志的画也各具一格。要达到这一步当然很不容易，一个要多写多画，更重要的要勤于思考善于实践，慢慢摸索，努力培养和不断追求，靠模拟和小聪明是做不到的。因为文艺作品只有具备个性和地方性才能具备民族性，具备民族性才能有国际性。不然千人一面，万部一腔，

谁愿意看你的呢？我们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批刻意求新、独具风格的作家和艺术家，因此我们的一批作品在全国较有影响。这一特点我们一定要好好坚持，象叶蔚林《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的潇水风光，古华作品中的山区小镇的林区景象，孙健忠作品中的土家山寨风习，都独具色彩。再如长沙花鼓戏《楼台会》，梁山伯与祝英台再次相会后，已成永远不能结合的悲剧，一个要走又不愿走，一个要送又不让送，凄凄切切，反反复复，最后梁山伯竟咬了祝英台一口，使她放了马缰，才走了。这个梁山伯“咬一口”，当然只有民间的地方小戏才可能出现，也只有湖南花鼓戏才独有，对此，全国戏剧界都普遍赞赏，原因就是独异而富于我们的地方特色。

第四、我们拥有一批文艺创作的新秀，近些年上得较快，来势颇好，出现了一派大好局面。这是我省文坛的第四个特点。湖南的创作力量，除了几个老人，现在活跃的可以说都是解放后五星红旗下成长的。五十年代一批，六十年代一批，现在都进入了中年，正值年富力强，是我们创作队伍的中坚。其中未央、谢璞、刘勇、周健明、任光椿、萧育轩等较早为读者所知，这之间还包括王以平、石太瑞、胡英、彭伦平等。叶蔚林、古华、孙健忠、莫应丰、张步真、谭谈也先后于五十、六十年代开始写作，有的并也早已赢得了读者，不过他们的思想、生活、艺术则是在历经磨炼之后，这几年才光辉特异而开始闪现于全国。他们由于是解放后成长而对党和社会主义感情很深，生活、艺术根基也较厚。“文化大革命”后涌现的一批新人数量大大超过过去，他们的起

点，实事求是地说，比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文学青年还要高。因为社会前进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出现了种种曲折和失误，走了弯路，经历了十年内乱；但整个来说，经济和文化都逐步在提高，今天我们涌现出来的新人就不同于前两个时期了。这批新人在学校或一出学校就体验了复杂的动乱，有的当过兵、下过农村、进过工厂，有的又重新上了大学。他们大多拥有曲折、坎坷和意义不凡的生活，并有过一个个幼稚幻想的追求及其屡遭破灭后的种种苦闷和疑问。其中除了极少数一时迈上歧途或还在彷徨之外，大多数则在挣脱苦闷中百般探索疑问的答案，并自然地结合自己努力钻研书本，反复、多方地思考当前生活与寻求前途。当然也有人是在不慎读了和被蒙蔽于唯心论、现代派、存在主义等等思潮之后而虚无地接近文艺的，不过这终是个别青年，也难以坚持长久。更多的则是读了各种观点的书并针对现实世界再三思索和检验后，发现仍然只有马列主义才是解除苦闷的出路所在；于是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同时也读哲学、读历史、读美学、读古今中外文艺作品和理论。这些青年并且惯于互相切磋、争论，互助互学，集思广益。因此见多识广，思想敏锐，生活丰富，感情深厚，往往一露头就朝气蓬勃。他们不是几个而是相当的一批，在短短几年中，有的写出了中、长篇作品，有的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象韩少功、水运宪、张新奇、叶之蓁、贺梦凡、田舒强、肖为、李慕贤、梅中泉、王友生、骆晓戈、盛和煜等，真是数不胜数。我们有这支生力军，确实是一大特点，也是

我省文艺不断兴旺繁荣的希望。

这当然决不是说我们可以自满自足。文学事业是一件长期而极其艰巨的事业，犹如没有尽头的马拉松赛跑一样，一开头就跑在前面的固然可贵，但更可贵者则在能坚持到底超前列，何况还有后来居上而尤其可贵的。我们省的创作队伍在全国文学创作的马拉松竞赛中，也不过有少数几位同志在一两个回合里跑得稍稍靠前，其它比我们势力雄厚和位列前茅的省、市、区还不少，北京、陕西、安徽的中、青年作家就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我们。即使不说力量强大的北京，单讲陕西省的作家群中，就有大部分同志是农村基层干部和回乡知青，而我们大多则是下乡知青和干部，他们的生活基础和地方气质就远比我们厚实得多。而且，我们也只是前几年成绩稍稍显著一点，今年以来出现的新作新人虽仍然不少，质量则还很少象前几年那样受到较为广泛注意的。因而必须切切实实地谨慎、谦虚，尽全力争取新作新人生生不已，并不断地后来居上。

以上就是关于近年来湖南文艺创作上若干特色的个人所见。自然难免片面和不妥，而且即使是分析到的也都不透不深；提到的作品和作者更未经全面衡量，主要只涉及了本书所论及的，另外不过补充了几位未论及而又较活跃的主要是小说作者的名字。下面再就湖南文艺创作近几年出现若干盛况的原因略述一二，不用说，这也同样仅仅是个人所见的。

我们取得成绩的首要一条，是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左”倾路线被逐步摧垮，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讨论，尤其是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的制订贯彻，从根本上大大促进了我们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精神生活的活跃，因而我们的文学艺术才得以出现繁花似锦的局面。如果没有思想解放运动，没有三中全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管我们作家、艺术家个人怎样努力，想象如何美好，也是不可能出现文化的进步和文艺的繁荣的。可以说，政治的民主带来了文艺的民主，文艺的民主带来了创作上的百花齐放。如果低估了这一点，或认为创作成绩只是个人奋斗来的，那就是本末倒置。

其次，是省委和各级党委对文艺的领导、关心和支持的结果。几年来，省委对我们文艺创作是放手而又积极的引导，这对文艺界出现思想解放而又稳妥的健康局面当然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每遇社会上思潮波动，引起作家、艺术家思想有所混乱的时候，省委和宣传部的领导总是支持我们坚持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彻“双百”方针；对我们的成绩更总是予以鼓励。衡阳、常德、益阳、零陵、长沙、株洲等地、市的领导对文艺也很关心、重视。因此，作家、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大胆放心，很少有后顾之忧，创作热情得以不断高涨。

其三，是我们作家、艺术家本身的努力。我们省的中青年文学主力大多创作力旺盛，政治上也都是健康的，那种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个别害群之马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严重的人，现在还没有发现。大家的思想、生活和艺术又都有一定根底，创作态度上也大都比较严肃，埋头苦干，刻苦

创新，努力突破，有一股你追我赶的劲头。文艺创作不下苦功夫是不行的。巴尔扎克说过他“拿起工作就失望，放下工作又难受”。冼星海写《黄河大合唱》，就艰苦、深入地同黄河的船工生活了一段。茅盾写《子夜》，也曾到交易所体验生活。赵树理坚持大众化、民族化，几十年如一日，被歧视到当校对仍不悔。这都是我们的榜样。而我们省象古华、张步真的长期坚持深入生活，莫应丰、任光椿不计艰险地刻苦写作，孙健忠为了生活和写作甚至春节都不回家等等事迹，这也都是近年的创作获得成就的直接原因；并促使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努力锻炼，永不满足，以不断求得我省文艺创作的发展。

其四，我们各级文联、协会和文化、出版部门以及文学研究机构与大专院校同志的密切配合，各种报刊和广大编辑以及文艺评论工作者的努力，也给了作家、艺术家很大的帮助。他们提供发表和出版园地，并通过评论和研究予以鼓励、分析、批评和促进。可以说，作者们的作品的发表和进步，都浇灌着编辑、评论家和各级文化、文艺组织工作者的心血，他们是我们文坛上应该永记不忘的无名英雄。

当前我们湖南的创作还有许多不足和问题，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我省与全国各地一样，思想的活跃和创作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不断出现种种新的矛盾。主要是既有自由化的倾向，也有继续清“左”的问题。比如对文艺的方向、方针、认识上还并未完全一致。又如个别论者只强调现实主义，而忽视“革命”的前提。个别作品格调不高，甚至